

当代文学史

简编

山东师专当代文学学校际教研组编



目 录

第三编 一九六六——一九六七的文学.....	(1)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论争.....	(1)
第二章 本时期的文学创作.....	(9)
第一节 概述.....	(9)
第二节 浩然的小说.....	(19)
第三节 《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京剧.....	(26)
第四节 《天安门诗抄》.....	(33)
第四编 一九七六——一九七九年的文学.....	(42)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论争.....	(42)
第二章 本时期的文学创作.....	(57)
第一节 概述.....	(57)
第二节 《班主任》和《乔厂长上任记》.....	(72)
第三节 王蒙及其短篇小说.....	(82)
第四节 《天云山传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93)
第五节 姚雪垠及其《李自成》.....	(102)
第六节 艾青、柯岩、李瑛的诗.....	(112)
第七节 《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人妖之间》.....	(130)
第八节 《报春花》、《未来在召唤》.....	(138)
第九节 建国三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概述	(151)
编 后	(168)

1209.7

05
:2

第三编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文学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论争

从一九六六年春天开始，到一九七六年秋这十余年，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历史上，是一个严重的倒退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被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所把持，使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从工农业生产到文化教育事业，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都遭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难，国家和民族濒临百业俱废的危机。作为重灾区的文学艺术，出现的大倒退尤为严重。

一、《纪要》的出笼及其反动性

这段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历史，是从文化方面打开缺口的。产生于六六年春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开始结伙作乱的一个重要标记。

早在一九六四年前后，林彪、江青便利用我们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的“左”倾路线，开始编造出了种种污蔑文艺工作的谎言。在全国现代戏观摩汇演大会上，江

青大放厥词第一次公开以新中国文艺队伍为敌。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江青在上海策划了旨在扼杀文化艺术的所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阴谋。六六年二月，与林彪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在上海组织了历时十多天的座谈会，并拼凑了一个联合署名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抛弃党的二万方针，排斥中外文化遗产，构织了一付文化专制主义的罗网。他们在《纪要》中公然宣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对这个贯串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民主思想的《纪要》，林彪视为至宝，在三月二十日写信给中央军委常委，予以大力推荐和吹捧。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向全国。

《纪要》的要害，是全盘否定新中国文艺工作和文艺队伍的所谓“黑线专政”论。这个“黑线专政”论，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全部计划：以文艺阵地作为“突破口”，进而扩展到各条战线，把我们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全部抹黑、颠倒、推翻；把担负各级负责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全部罢官、打倒，把广大人民群众置于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专制制度之下。这个《纪要》由他们后来的丑行劣迹证明，是破坏革命事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屠刀，是把历史推向黑暗深渊的反革命宣言书。

二、对文艺队伍的大围剿、大扫荡

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借助于

“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对新中国文艺园地进行了一场大围剿、大迫害、大扫荡，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悲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经过秘密策划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制造了一个用“莫须有”的罪名，大张挞伐地扼杀文艺，迫害作家的先例。六七年四月他们又借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时机，公开加罪于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然后打倒在地。这种极左的高压政策，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横行提供了适宜的政治气候。于是，我国文艺界便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摧残。

一方面，一些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被一一宰割，痛加批判，什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为彭德怀翻案的铁证”；什么“丑化工农兵的险恶用心”，“美化资产阶级的黑货”；什么“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活标本”，“为修正主义鸣锣开道的招魂幡”等等，几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几乎全部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或被付之一炬，或被打入冷宫。在古典作品的宝库中，仅剩下一部《红楼梦》，全部现代小说，只剩下一二个人的作品，诗歌园地也只剩下了毛主席的诗词，至于戏剧作品除被江青抢为已有的以外，一律难再问世。江青一伙文化专制者看来，无产阶级文化领域，一百多年来只有一片“空白”。于是在十年浩劫中书店没有文艺书卖，读者没有文艺书看，剧场影院只有“样板”戏，电台广播只有语录歌。在“红色恐怖”笼罩下的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一片萧索冷落。

另一方面，他们又口诛笔伐，鸣鞭舞械，对多年来在党

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作家，艺术家，残酷迫害、百般镇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那些成就卓著的老作家，艺术家，一个个被围攻、被监禁。持续多年的迫害，把一大批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整得名败身残，有的衔冤死去。原中国文联付主席老舍同志，多年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勤奋刻苦地为人民写了大量优秀作品，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但在一九六六年的狂热运动中，却遭到野蛮摧残，在一起殴打文艺工作者的暴力事件中，被夺去了生命。著名作家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几十年来写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也被打成“叛徒”，多次惨遭毒打，直至含恨而死。还有许多作家、演员、画家等艺术家，莫名其妙地被抄家、绑架、被投进监狱，长期过着非人的生活，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一九七九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据粗略统计就有一百余名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死于非命。尤其使人愤慨的是，他们无限扩大迫害面。象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一案，就牵连上万人。又如一九七〇年，他们还在上海制造“桑伟川事件”，把一个敢于抵制专制主义的青年技术员，肆意污陷投入监狱，长达七年之久。

三、阴谋文艺的出笼及党和人民的斗争

林彪、江青集团在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历程中，一方面对中外文化遗产和革命文艺成果实行大扫荡，另一方面又拚命抓旗帜、捞资本，处心积虑地炮制为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服务的棍子文艺和阴谋文艺。

大树所谓“样板戏”的活动是他们的第一步。

一九六六年二月，《纪要》一出笼，他们就立即宣布《红灯记》等八个剧目是江青的“革命创举”，并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在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宣称江青是京剧革命的“带头人”，八出戏也从此被正式定为“样板戏”。这完全是一个大骗局。因为这几出戏早已编演多年，其基本情节与人物设置都已大体定型，并已在倡导革命现代戏的运动中获得了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肯定与称赞。江青看到有利可图，便以“特殊身份”窜入剧团，指手划脚地把原作者踢到一边，当起这些戏剧的所谓“艺术设计师”，还喋喋不休地自我宣扬说样板戏是她“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的结果。一九六八年五月，于会泳又在上海发表文章鼓吹“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扬言“根据江青指示精神”，炮制出所谓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还有什么“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创作主张。这一套荒谬的公式，便成为所谓“样板戏”的理论基础，被一时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成为“四人帮”“捍卫旗手”、拥戴“女皇”的棍子。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上海的追随者开始了帮风文艺的创作。那部说教和谎言的大杂烩，概念图解式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叛国摔死。不但打破了他们经营多年的“一贯高举”的神话，也鼓舞了人民与魔鬼斗争的信心。历史出现了某种转机。

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的文艺情况批评说：现在电影、戏剧文学作品少了。七五年又批评说：“百花齐放没有了”，“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从七二年起，周总理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批判林彪、整顿发展科技、文教的设想和意见，并多次反映人民的意愿，批评“电影太少”。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批评深深地戳穿了“四人帮”文化专制的铁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二年，反映教育工作整顿成果的湘剧《园丁之歌》创作并演出。七五年，反映石油工人斗争生活的电影《创业》和反映海防民兵生活的电影《海霞》相继问世。这些带着清新生活气息的作品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真正的时代潮流。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群众的称赞。但是，还把持着相当大权力的“四人帮”并不甘心放弃文艺阵地。七三年，他们成立了喉舌机构“创办”，化名“初澜”“江天”等，又开始了新的鼓噪。同年五月，杀气腾腾的帮刊《朝霞》也在上海创办。围绕着《创业》几个作品，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对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审查时横加指责，冠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的大帽子，以国务院文化组的名义发禁映文件，并在报刊上大登批判文章。直到七四年，毛泽东同志看过剧并为之鼓掌之后，他们还把这一消息当成谣言追查、封锁，继续扣发影片。

七五年春节，中央领导同志审查影片《海霞》，一致表示肯定和赞赏，并建议有关部门用以招待国际友人。但江青却派人查封此片，并组织批判，胡说《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直到中央政治局审看以后，才粉碎了“四人

帮”对这部影片的围剿。

长春电影厂摄制的电影《创业》，当时是深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好作品。但刚放一天，就被“四人帮”查禁。原来，江青看了此片以后，大发雷霆，说什么“怎么搞这样的片子，这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再搞这样的片子就要出修正主义了”。并指使查背景，审作者，发禁令，搞围剿。七五年四月八日，江青亲自策划，给《创业》罗织了所谓“十大罪状”，妄图把这部新影片扼死。

正当“四人帮”挥舞大棒的时候，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对《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的信件作了批示，指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一批示，挫败了“四人帮”的猖狂阴谋，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

对毛主席的批示，“四人帮”仍然费尽心机进行对抗。一是拖延时间，迟迟不作传达。不得已才于八月份在极小的范围内讲了一下。二是叫嚷“要顶住”，说“路线正确……不怕攻”，竭力缩小批示的影响；三是篡改，胡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嘛”，“求全的用意还是好的嘛”等等。四是抵赖，江青本是祸首，却说什么“十条不是我搞的，我们也没有批准”，企图赖帐。尽管中央明令“通过发行”，但由于“四人帮”的作祟，《创业》的放映仍受到严密控制。一九七五年十月，《解放军文艺》冲破他们的压制，终于勇敢地发表了《创业》的文学剧本。

可见围绕《园丁之歌》、《海霞》、《创业》等几个作品而表现的不同态度，说明在祖国大地上还孕育着一场新的

政治较量。

一九七四年在全国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兴起了一股矛头指向老一辈革命家的恶浪，作为反映在文艺领域里的突出情况，是震骇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四人帮对这个参加华北地区调演的剧目，以“为刘少奇翻案”的奇特罪名，围剿作品，迫害作家，由此造成了全国上下抓影射、批回潮的歪风。

一九七五年秋，“四人帮”又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水浒》的谈话的原意，挑起了一场所谓“评《水浒》，批宋江，抓现代投降派”的恶作剧。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帮”伺机而起，在全国上下搞起了所谓“痛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妄图利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连续去世，加快篡党夺权步伐。为此，他们又苦心经营，炮制出了一系列毒汁四溅的阴谋文艺作品，包括诗歌《西沙之战》、小说《初春的早晨》、电影《春苗》、《决裂》、《反击》等。“四人帮”的重要头目江青、张春桥亲自策划大写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借以大整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一场黑风又在中国上空兴妖作怪。当然，人民是不会沉默的，丙辰清明的诗歌运动予示了即将到来的天翻地覆之变。

总之，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是文化专制主义兴风作浪，我国文艺园地倍受摧残的十年，也是党和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十年。十年浩劫，十年锻炼，经过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复兴期就要到来，而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二章

本时期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

概 述

这十年，林彪“四人帮”一伙窃取了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他们利用所篡夺的政治权力，推行极左路线，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他们全盘否定我国“五四”以来和建国十七年以来文学艺术的光辉成就，他们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诬蔑为“黑线专政”，把大量的优秀作品打成“毒草”，他们砸烂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查禁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他们把大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干部打成“黑线人物”、“叛徒”、“特务”、“反革命”，进行批斗、凌辱，甚至投进监狱，许多优秀的文学家被迫害致残，甚至含冤而死。这十年，是我国文艺史上最黑暗的年代，社会主义文艺蒙受了一场空前浩劫，全国出现了百花凋零，文坛荒芜的悲惨景象。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五年七月谈话中所指出的：在这个期间，“百花齐放没有了”、“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在八亿人口的大国里，只有八个所谓“革命样板戏”在舞台上不厌其烦地演出，就是这几个革命现代戏，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前几年辛勤创造出来

的，并不是江青之流“呕心沥血”创造的。

“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他们背弃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割断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用谎言和伪造代替生活和艺术的真实，他们歪曲文艺和政治的正确关系，用反革命的政治奴役艺术，使文艺成为瞒和骗的文艺。他们在文艺理论上散布所谓“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之类的谬论，取代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一九六九年“四人帮”通过总结《智取威虎山》的所谓创作经验，正式抛出来的，即：文艺作品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一九七三年以后，“四人帮”又把“三突出”加以“发展”，抛出什么“三对头”、“三陪衬”、“多层次”、“多侧面”等等一系列体现“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三字经”。直到“四人帮”跨台以前，“三突出”、“三字经”成了文艺界的“创作宪法”。他们并且将这类谬论用专政的手段强制推行，他们大肆鼓吹“写文化大革命”，“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来丑化广大人民、革命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

“四人帮”在一九七三年创刊的邦刊《朝霞》上就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不少适应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按照“三突出的模式炮制的作品，诸如：《上海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千秋业》、《盛大的节日》等。为了扩大这些作品的影响，他们还收集成书（《序曲》）到处兜售。

这类“阴谋文艺”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打着“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为“四人帮”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小说《初春的早晨》直接为王洪文树碑立传，替张春桥歌功颂德。作品着力塑造了一个“三十二、三岁”的“名气老响”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司令”郭子坤，这个挎着旧黄布包的复员军人，象“蒙马特尔高地”上“英勇的巴黎工人”，“在革命这幅充实、丰富的图画中”，最深刻的一笔是郭子坤画的，由于“历史潮流推荐”，“他已经是市里的一位领导人了”。作者唯恐别人看不出来特意申明说：“我故意把他写成汽车司机，又写成四川人。这样，别人就不能说我是在写王洪文了”，真是欲盖弥彰。作品中“造反司令”说：“最近，我在市里开会，有位同志说得好，夺权，就是要使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张春桥脑后画光圈。小说《第一课》则是为“四人帮”的另一个头子姚文元树碑坊，胡说姚文元的一篇反党黑文给人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给读者上了“真正的第一课”。

（二）鼓吹“与走资派作斗争”，歪曲、丑化一大批党政军的革命领导干部。《朝霞》上出现的“走资派”，无不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参加党的老干部。其中有“一九三四的红军干部”，“一九三九年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代表”。《朝霞》写了一大批有“光荣历史”的老干部，并不是为了歌颂党，而是为了告诉读者：过去的“革命者”，今天已成了“走资派”，昔日的“功臣”正是今日的“罪人”。有的作品还恶意塑造“军内走资派”的形象，《前线》，《千秋业》就是此类代表作。前者恶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所谓“不肯改

悔的走资派的”防空洞，后者则进一步煽动揪所谓军内“大走资派”，要夺军队的权。这些毒草肆意渲染“走资派”到处“走”，把党的各级组织描绘得一团漆黑，目的是摧毁我们的党，从而实现张春桥说的“改朝换代”，另立他们封修大杂烩的“新天朝”。

（三）打着歌颂“新生事物”的幌子，炮制所谓“触及时事”的作品，影射、攻击周总理，为其篡党夺权服务。小说《试航》写的是我国万吨轮试航的故事。作品编造了一个所谓“走资派”要进口外国先进样机而故意刁难用国产万匹机去试行的情节，借以影射周总理。原来，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我国试制万匹机的实际情况，曾指出说：主机航行海外，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影响，一定要讲究质量。周总理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惯于搞鬼域伎俩的“四人帮”，却以为有机可乘，立刻大布围剿阵，大叫文艺作品要“触及时事，写出深度”，一定要提到“进口样机就是否定新生事物，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卖国”的高度。这就是“四人帮”打着拥护新生事物的幌子，大整国务院，大反总理的“寓意”。

（四）在宣扬“打倒一切”的同时，塑造了一批实质是反革命的所谓“新人”。这些“新人”的共同特点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张口造反，闭口夺权，伸手要官”。其实都是一批地痞、文痞、流氓、打砸抢者，反革命分子。《初试锋芒》中的江兴，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他整天唱着：“民兵最重要的是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至于军事训练，生产劳动，民兵搞多了就会“偏向”。所以他干脆拉了一支队伍到里弄去抓“阶级斗争”。“四人帮”正是要通过所谓反潮流“英雄”，江兴这号人，拉起“一支支铁流”似的

“武装队伍”，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去“冲锋陷阵”。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四届“人大”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公然抛出了“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同时提出了“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反动口号，于是毒草电影《春苗》、《反击》、《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等纷纷出笼。《反击》着力塑造了一个资格老、权势大，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典型——韩凌。韩凌被描写的昏庸无知，腐败不堪，凶恶残暴，顽固不化，连他主持的省委也烂掉了，而且他是有根子的，根子在“中央”。这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都在干着“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的坏事，只有让反潮流“英雄”，“救世主”江涛之流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不可了。由此可见，“四人帮”炮制这部影片，就是为了丑化革命老干部，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本时期，在文艺界也出现极少数趋势附势的作家，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按照“四人帮”的调子，写了一部分错误的作品。《骑马挂枪走天下》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炮制出《西沙之战》那样的艺术畸形儿。西沙自卫反击战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号令和指挥下，南海前哨我陆、海、空三军和渔民、民兵英勇作战，取得的胜利。而诗报告《西沙之战》却按照“三突出”的原则，一个劲儿突出江青，在江青身上大做文章：舰

长的视线投向挂历，挂历上一幅壮丽的画卷：飞渡的乱云，从容的劲松，无限的风光，巍峨的庐山——这就是江青摄的一张风景照片。这张照片在关键时刻变成了“无声的命令”和“精神原子弹”而大显神威！是它鼓舞着海军战士“冲上去！冲上去！”取得了胜利。似乎要不是有江青的一张照片，这次战斗就不能取胜。“诗报告”千方百计要把江青装扮成西沙作战胜利的“鼓舞者”和“力量的源泉”。借西沙之战，为江青树碑立传，这就是炮制“诗报告”的用心所在。

《艳阳天》的作者，曾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写过一些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但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却走上了创作的邪路。一九七六年他适应“四人帮”政治需要，炮制了中篇小说《三把火》（后改名为《百花川》）。作品围绕着“造反英雄”杨国珍大整走资派常自得的所谓“生动的故事情节”，去再现什么“我国农村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经几个回合，自然是以“走资派”的失败而告终。作品中的常自得，出身很好，工作勤勤恳恳，是个善于抓生产，抓经营管理的生产队长。对于这样一个靠吃工分的农村基层干部，作者硬给他扣上一顶“不肯改悔的走变派”的帽子。并且写他“罪行累累”：文化大革命前他热心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三自一包；宣扬“公社化，全靠工分吃饭，没有阶级了”；“他不抓政治思想，专搞物质刺激；他不抓粮，光捞钱”等等。这样一个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当然只能彻底打倒。作者还着力塑造一个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人物”——杨国珍。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冲杀出来的红卫兵小将”；“九大”以后回乡知识青年中的

优秀团员；批林批孔运动中被纳新的共产党员”。在梨园村她一贯正确，独具慧眼，专门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对着干”，到处放火，捏造罪名，迫害老队长常自得，并把他轰下台。作者竭力把杨国珍美化成“高大全”的人物。为了“突出”杨国珍，作者杜撰情节，“多侧面”地丑化党员，丑化群众，为进一步美化杨国珍这个人物作“铺垫”。在这里，忠心耿耿的老党员，已经“老陈了”，“政治觉悟低”，是窝囊费；关心集体的老贫农，也成了“走资派”的“隐身草”、“马前卒”，是十足的“糊涂虫”。然而，不管作者如何美化杨国珍，为她铺设垫脚石，也改变不了这个形象的反动本质。杨国珍是按照“四人帮”的政治需要和理想，用“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捏造出来的“帮”英雄。这一形象正是“四人帮”鼓吹的“一代新人撵旧人”的政治阴谋的图解。在“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有些作品虽然不是毒草，但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如：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戏剧《苗岭风云》、《磐石湾》；电影《艳阳天》、《青松岭》等。

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文艺界造成深重灾难，但他们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完全打断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进程。毛泽东同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出了不少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周恩来同志在身患重病，工作处于逆境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党的文艺事业，关怀着文艺工作者的命运。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不少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免遭荼毒。他始终同广大文艺工作者心连心。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四人帮”淫威面前屈服。他们敢于冒万死，通过公开或隐瞒曲折的方式坚持斗争。革命文艺工作